

1608

安陽縣文史資料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安陽縣文史資料

第五輯

(內部發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河南省安陽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一九九五年三月

主 编：周万民
编 辑：周万民、张廷玉、刘爱荣

EC76/32

安阳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安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浚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解放前安阳农村景况	刘本清 孟广文 (1)
忆在安阳高中的生活片断	张振海 (21)
安阳县立中学始末	王庭梧 (33)
漫谈抗战时期的建勋中学	张振海 (37)
抗战前后安阳县教育概况片断回顾	王建榛 (44)
我读书的学校	董汉杰 (48)
学海漫游之回顾	王庭梧 (52)
清末至抗日战争前后安阳教育情况	刘书文 (60)
栗树桐和他的皮影戏	陶陶、咏梅 (78)
康锅子和他的落腔剧团	闻 广 (82)
名艺人王福学	崔立功 (86)
我的戏剧文学生涯	宋 词 (88)
吕村战鼓	陶陶 申玉生、南太生 (94)
武林高手显身茱兰岩	李廷寅、李金喜 (99)
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资料	郭好文、张宏民摘录 (101)
洪涯迁民传说	郭好文 (106)
盐罐寺和关公道	张振海 (110)
安阳县电影事业追溯	马多怀 (113)
《劝戒毒品》歌	董汉杰回忆整理 (123)
解放战争时期流行于安阳东部的歌曲	陶陶 王国庆 (126)
民谣十六则	李俊卿 (132)

回忆祖父杨寿先.....	杨兴华(136)
安阳杨公寿先墓志铭.....	(139)
我的父亲杨庆初.....	杨达民(141)
国民党陆军四十军军长李振清轶事.....	许义生(148)
我的父亲段文炳.....	段运涛(151)
由和尚到军人.....	袁玉明口述, 春熙整理(153)
张廷政何许人也.....	俊 卿(164)
观丰铁路及观丰铁路占地案.....	高清瑞、李海生、徐志海(167)
女子放脚活动片断回忆.....	吴兆珍(170)
安阳县立宪国大代表选举侧记.....	杨诗经(171)
九·二六烈士会的由来.....	李廷吉、李全喜(173)
史话水冶工商业.....	来世瑜、杨文贵口述、万民整理(175)
飞机治虫在安阳.....	杨再春(179)
安阳县农用飞机的来历.....	邢福祥(181)
解放前的豆芽村——陈家井.....	马启蛟(183)
岭头特产——核桃.....	王怀筠(185)
原始洞穴简介.....	申兴法(187)
韩陵片石.....	(189)
晚清以来安阳县文化、教育界名人录(一).....	(191)

解放前安阳县农村社会景况

孟广文 刘本清

安阳地处冀豫两省交界。西部山区，矿产丰饶；东部平原，土质肥沃。在近代，是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县份之一。

1903年，芦汉铁路通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洋货”大批倾销安阳，激发了一些有民族思想的地主官僚、富商大贾兴办实业的热情。到20年代中期，城乡市场出现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发达局面。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国民党各级政府的横征暴敛，军阀连年混战，土匪盗贼四起，封建地主阶级残暴压迫和残酷剥削，致使全县农村日益贫困，农民生活极端困苦。

(一)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洋货”倾销，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刺激了安阳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安阳原是以手工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由于交通不便和运输工具落后，外销的粮食、棉花、烟叶、药材和煤炭等全靠牛车、独轮小车、洹河航运和担挑、牲口驮。因货运量有限，销路不远，致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缓慢。

1903年，横贯全县的京汉（始称芦汉）铁路通车，安阳境内设立了丰乐、安阳、宝莲寺三个车站，又修建了观丰轻便铁路，安阳城乡交通逐渐发达起来，市场日益繁荣。

伴随着城乡交通运输的发达，大批洋货进入城、乡市场，打击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例如洋面、洋油、洋火、洋蜡、洋烟、洋线、洋布、洋袜子、洋车等等。

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一些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地主官僚、富商大户，便产生了“竞争生存、振兴民生，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激情，仿照“洋人”兴办实业。

西蒋村大官僚地主马吉森和外地官僚谭士禎等集资六万两白银，于1903年在观台镇南山兴办六河沟煤矿。1907年，吴懋、叶润全等又续股34万两白银，叶任经理，并请德国商人为顾问，改用机器生产，修筑了观丰运煤铁路，煤炭畅销，成为全国十矿之冠。

马吉森、郑子固、徐仙洲集资150万银洋，兴办广益纱厂（今豫北棉纺织厂）。1928年霍栋庭、孙文庵、刘敬良等集资20万银洋续股，易名“豫新纱厂”。

中崇义村官僚地主张凤台和刘吉生、张重九等人集资，在下堡村兴办了益安煤矿公司。1918年开始采用机器生产，并修筑了一条通水冶镇的运煤小铁路。

安阳城内富商刘丰、马声援、王伟先、王伟尘、李次禎联合集资，在谢家庄三泉寺兴办“三泉寺煤矿公司”，在积善村兴办了宝兴煤矿公司，和矿窑炼铁厂，南平“同和长石公司”。

安阳人阮雯中，在安阳车站兴办“元丰蛋业公司”1916年开始投产。到1928年因亏损续股易名同记蛋厂。

商人韩华清在安阳车站北侧开办“大和恒面粉公司”张德润开办了德瑞兴小磨面厂。

刘冠瀛、崔宝珊在安阳车站附近开办电灯有限公司。到1932年，又有商人李拂尘、孙子文、杨秀峰、刘步洲、马子贞等续股

10万元，扩建厂房、更新设备，易名“安阳电气有限公司”。

安阳上绅徐昭洁请准安阳县国民政府，购木机八架，在“袁林”开设毛巾厂。城内商人马绍庭在北马道街开办孚惠织布厂。安装铁机30台、木机50台。雇用工人180名，日产布匹6000尺。在县前街还有薛蕴卿开办的华丰织布厂。

天津人刘某在安阳车站开设振兴铁工厂。有20名工人，专生产煤矿用的高车。铁路工人蓝某在洪河屯集开设翻砂厂，专制造轧花车。后有广益纱厂工头在安阳西关开设宝鑫铁工厂。不久，易名“中华铁工厂”。

安阳日有工业，有固现土纸，化炉冶铁，方山石灰，水冶镇的毡帽、毛毡，杨大庆的剪刀，福聚堂的毛笔。

随着交通发达，新兴工业兴起，带动了商业兴旺，城乡集市繁荣。安阳沦陷以前，全县城乡18集场，处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兴旺景象。安阳外贸出口的棉花、粮食、烟叶、煤炭和药材，原靠独轮车运输，不仅运量有限，而且运途很短。京汉铁路通车后，畅销全国各地。煤炭和棉花远销日本。到20年代初，安阳成为“工业重镇”。

(二)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县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全县农村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遭到破坏，封建地主阶级中又分化和崛起了官僚地主、工商业地主、土匪恶霸地主、破落地主、土地主和佃地主。

第一，官僚地主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安阳以前，安阳县最大的封建官僚地主，有袁世凯、马丕瑶、张凤台三家；

袁世凯，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1913.10—1915.12）。在安阳一带有土地四万余亩，在项城、卫辉还有大量土地。袁于1908年隐居安阳后，就通过“放租子”兼并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庄园。在浚北购地二百亩，建筑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庄园——“浚上村”，又名“袁宅”共有九个庭院，袁的九房妻妾各住一院。袁住的正厅，曰“养寿堂”。庄园四周，建筑了高厚围墙和四个岗楼，供袁家警卫营居住。靠袁宅东边修建了一处与北京“三海公园”媲美的私园——养寿园。园内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林峻石，珍禽异鸟，可谓俱全。延伸天平渠引漳水至园中，一年四季小溪长流，汇成小湖。湖中放有小船，供袁世凯钓鱼取乐。1916年6月16日袁病故以后，葬于浚北龙虎庄，又为袁建造了一处太陵园。东临官道，松柏成林故取名“袁林”。现为“袁林博物馆”，供人民游览。

马丕瑤，安阳西蒋村人。曾由晚清知县、知府升任巡抚。仅蒋村一带就有土地2900余亩。马有四子，给每人建筑了一所与帝王的皇宫攀比的“清朝庄”庄院和一处花园。长子马吉森的堂号“庆元堂”，次子马吉章的堂号“福心堂”，三子马吉梅的堂号“嘉桂堂”，四子马吉桓的堂号“阳正堂”。尤其是“嘉桂堂”的建筑形式，是模仿清“西宫”设计的中外结合的建筑风格，很有官僚家庭的气派。过往行人走到庄前，一律下马下车步行，以显示马家尊严。解放后，马家庄园收归国家所有，由师范学校和区政府占用。（现为安阳县一中校址）

张凤台，安阳中崇义人，清光绪年间进士，民国初年任河南省长，仅崇义村有土地五百余亩。

第二，工商业地主：

伴随着工商业发展，新崛起一批地主兼工商业和工商业兼地

主。

袁世凯的九姨太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28年夏天，河南省政府兼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马玉祥，下令没收了袁家在安阳的财产，焚毁了放租子的“红契文书”，结束了袁家在安阳长达20年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的九姨太，还有3000亩私地和三万元积蓄，就交袁信在安阳城内开设了“协泰厚”钱庄和“同泰沅”绸缎庄。既放高利贷，又经营绸缎和棉花。五年时间，净获暴利150万元。又给“豫新纱厂”入股转向办工业。在当时，成为安阳著名的工商业地主。

阜城村李鸿伯，在20年代，是以种烟叶、开卷烟厂和买办烟叶起家的，到30年代，买地7000余亩，全家24人，人均土地292亩。阜城村一千多户，70%左右的户都是他们的佃户和长工。他家九座庄园，雇佣40名庄丁保卫。李家的堂号“文锦堂”，有“太行山以东首户”之称。

前稻田孟殿卿、孟靖宇兄弟，在20年代以前，家里房无一间，仅有几亩薄田。后来，孟殿卿在安阳城开设“裕顺同”花行，孟靖宇在磁县城开设“协丰永”花行。磁县、安阳沦陷前，他兄弟俩都成为很有名声的资本家。孟殿卿还担任了安阳棉业商会会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他俩分别在安阳、磁县城内购买了庄院，又在前稻田购买了二百多亩土地，新建了一所楼院。

这批新崛起的工商地主，在安阳城近郊最多，如周家营、董车村、四盘磨等村，大部分都是城内工商地主的佃户。据解放时安阳、鄆县统计，两县的工商地主就有561家。

第三，破落地主

1915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导致军阀互相混

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19年，就将1927年以前税捐预征了。小地主、工商业者和富裕人家也深受其害。由于军阀混战，散兵游勇流落民间很多，不少人与土匪结伙，危害人民。受害者多是富裕人家。除此以外，有些地主吸食鸦片，也是走向没落破产道路的重要原因。另外，也有些特殊原因，如天灾人祸、实业亏损等。总之，一批新兴地主崛起的同时，却有些不搞实业，不与官府勾结的土地主，大都走向没落和破产的道路。

靳小庄地主靳老厚，是明代延续下来的地主世家。到1920年前后，还有三千多亩土地，后来，因款项重、土匪抢劫、当家人又抽大烟，这个地主世家逐渐破败。除当家人常年食米麦外，全家五六十口人全靠红高粱维持生活。到解放前夕，仅剩下千余亩土地。

前稻田村孟安仁，在20世纪初期，全家15人，有300多亩地，有三座庄园共80多间。所有土地全靠长工耕种。因孟安仁吸鸦片，仅几年时间，就卖掉土地200多亩，房屋40多间。到1917年，孟因给四个孩子分家，又卖土地70亩。最后留下14亩地，除去二亩养老地，每个孩子分三亩地。

东稻田段仁魁，在30年代，有200多亩土地。人口不多，家境殷实，人称“十六万”。就是说他有16万元的家业。按当时粮价计算，能买400万斤小麦。他因只会积蓄钱，不会混官场，1933年在安阳县政府打输一场官司，就将万贯家业卖得净尽。到解放前夕，他家已穷得要了饭。他的孙子，每到冬季头戴破毡帽，腰扎旧麻绳，手掂打狗棍，沿村讨饭。

第四，土匪恶霸地主

日本侵略军占领安阳以后，安阳（时改为彰德县）农村中又出现了一批恶霸土匪地主。这些土匪恶霸地主，有的是会道门、

枪会头子，有的是土匪、杆头，有的是伪军中大小头目，有的是日伪汉奸，还有的是封建集团的走狗。这些土匪恶霸地主，对待农民比老牌地主更恶毒。例如：

1、买空卖空，巧取豪夺

像北土匪首领之一王自全就是采取这种手段兼并土地的典型。

王自全，号建勋，乳名驴只，是安阳县王隆化人。1930年前，他先后在崇义、永和、白璧、许家湾等地当兵、当矿警，进而聚集兵痞、铤而走险，打家劫舍，扰害群众，天长日久，成为匪首。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溃退，日军大举南侵，安阳一带土匪蜂起。王乘机纠合匪众，暗结临漳匪首郭清占据了崔家桥，组织起“保险治安社”，自任大队长。周围30里内的村庄，畏郭清残暴，积极向王自全送粮捐款入社，以求苟安。这时，王自全财物收入如流，继续扩充实力，扩大地盘。1937年冬，日军同国民党军隔姜河对峙，各界人士也云集汤阴，组织民间抗日武装。王自全也赴汤阴求见安阳专员兼县长程起陆请示番号，要求抗日。程授王“安临联防自卫团”番号，命其组织民众，保卫乡土。到1941年，王自全暗杀皇协军第二路军少将军长大寒村实力人物李台后，开办训练班，开展地方行政，设立地方分团，买兵派枪（每50亩地出一支枪），扩充队伍，实力增至千人。地盘扩展到东西长75华里，南北宽65华里。到1942年，总兵力扩大为3个团，总计2700人，日军委任他为第一路军第一支队司令。

王自全的发家史，一是卖鸦片，二是巧取豪夺、兼并土地。

（1）买空卖空。如白璧棉业公司有三千亩土地。安阳沦陷前夕经理南逃，托人代卖。因有钱的大户南逃，穷人买不起。王自全

依靠权势就全买下，但不付钱，然后高价零卖，卖掉二千亩就卖够了地价，没拔分文钱得到540亩土地。(2)压价买地。如当时地价800元，他只出500元，一经王自全还了价，也就没人敢再要了。如果有人出的地价比他高，他就派人将那人请来说：你比我王自全还有钱的！现在我部开支困难，你先把钱借给我吧。对方如果推辞，他就说：“你看我王自全穷，还不起你！”对方如再坚持，就用“莫须有”的罪名处罚。王用此法兼并大量土地。(3)强行兼并。他买地先买两边和两头，将小块夹在中间，就把夹在中间地块的人叫到司令部，说：“你的地两边都是我的地，你耕种不方便卖给我吧，你再买一块！”实际上是不拿钱，也没人敢要钱。就用这种办法，在隆化、崔家桥、王彦兼并500多亩地。

王自全名为土匪司令，也是鸦片贩子，但在他的辖区，他只准自己卖不准别人卖。一经查获，抓到崔家桥就活埋。王贩卖鸦片发了大财，在京、津、沪、汉都有他的生意和房产。武汉洞庭街67号房子建得相当雅致。

2、诬良为盗、鱼肉乡里

这里介绍另一土匪首领程道合、程道生兄弟兼并土地手法。

程道生原是日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旅长。所部原是其兄程道合拉杆结伙的上匪武装，共有两个团的兵力。以程太保为中心，统治着东自楚旺，西至瓦店，南起神庙，北止回隆的四、五百个村庄。

七七事变前，其家是一般的中农家庭。安阳沦陷后，采取各种强盗手法，在十三太保强行吞并土地，几年时间，霸占农民土地三四百亩，成为虎踞府东的土匪恶霸地主。1938年秋天的一天，程道生带匪徒数人去秦太保游逛。早知程心事的女狗腿献计

诬陷刘堂只偷了程家两个棉桃。早想霸占刘家那六亩半好地的程道生，因找到霸占借口非常高兴。回到程太保匪部立刻派匪兵抓去刘堂只亲自审讯，严刑拷打。刘堂只没有偷他地里那花哪能招认？程道生得不到土地怎肯罢休，因将刘堂只打得不省人事，只好暂时扣押起来。刘堂只儿子听到父亲被抓，就知程部的险恶用心，托人求常献出六亩半地，才保出打得半死的父亲。

刘堂只被夺去六亩半地，无法维持全家生活，便领着一家人逃往外地。

翌年秋天，程道生又说存放在周、袁、蔡太保的20万斤小麦被盗，叫三个村全部包赔。仅周太保就包赔7.5万斤，害得六户人家又破产逃荒。周金生包赔2500斤小麦，气得双目失明，沦为乞丐。

在程道生的辖区，广大群众被讹诈得十分困苦，而程家弟兄却过着花天酒地的淫荡生活。程道增四个老婆，程道合五个老婆，程道生五个老婆还有三个姘头，年仅23岁的程万福也有四个老婆。程家弟兄四人，21个妻妾，满院花枝招展，真如一所找院。

8、利用饥荒，提高利率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旱灾蝗灾，两季无秋，在全县出现了“赤地百里，饿殍遍野”的灾荒局面。平汉路以东的平水地区，虽有二三成年景，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伪政府和伪军、民团横征暴敛，70%左右贫雇农缺吃少穿。一斗红梁要掺三斗粗粮，配树叶充饥。平汉路以西的旱地区和国民党占保的西南山区，青壮年逃山西、下关东，老弱妇孺饿死过半。马家乡大桥村31户，死的死、逃的逃、卖的卖，只留下一户，现归马家村。铺岭200多人，仅留下70余人。就在这样严重的灾荒年里，驻岭头的国民党县政府天天到各村逼粮逼款。地主阶级认为灾年是“发大

户”的极好机会，加重了高利贷盘剥。岭头村地主王志安，春天借出一斗，秋天本利要五斗。借给富裕户一斗，秋天本利要三斗。这一年西南山区，饿死的人成千上万，王志安却买地80亩。岭头村保长王树森买地40亩，副保长徐国合买地20亩。

4、利用派粮派秋进行高利贷盘剥。

在日军占领时期，安阳农村逐步形成封建地主、汉奸伪军、民团局子、土匪恶霸四位一体的统治。他们行使统治，剥削农民，主要是通过村秋权。例如永和乡贺庄有四户地主，依仗王自全的秘书刘金辰那把保护伞，隐瞒黑地500亩，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每次派款，规定的期限很短，要求很严。农民没钱可交，不得不向这四户地主借秋，他们就借机提高利息。有一年，他们四户放高利贷160万元，本利互翻，到年底翻为576万元。

第五，“土”地主

在安阳封建地主阶级中，还有一种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从工、四不会巴结官府的封建地主。安阳人称这样的地主为“土”地主。所以叫“土地主”，还因为它是“光棍”的菜，“眼子”的害，“混鬼”的肉。正如《续安阳县志》“社会志”对这样地主的描写：“有钱的怎能欢，也怕混鬼也怕官，地卖尽，房卖完，心里时常如刀刺。”这就说明“土地主”在当时既是官府搜刮的重点，又是混鬼“架肉票”、拦路抢劫的主要对象。但他们对贫苦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不次于大封建官僚地主。

这样的土地主，在土改时叫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时有的划成了“富农”。因为他们之中有的还保持勤俭传统，并参加轻微劳动。

第六，“佃”地主

在安阳农村中，尤其是安阳城近郊地主阶级中，还有一种“佃

地主”、“佃富农”，所以叫“佃地主”、“佃富农”，就是他们本来没有土地或土地不多，完全或大部分是租入的土地，提高租额转租他人，从中剥削佃农和长工。全家不劳动，依靠提高租额或剥削长工，获得大量剥削收入，其生活水平得到地主生活水平的，为佃地主。本人参加劳动，剥削收入超过其家收入25%的为佃富农。

佃地主、富农各地都富，比较说来还是近郊较多。如周家营80%的户都是佃农，有一户负责承办佃租发了家的，土改时划为佃地主。

(三)

帝、封、官沆瀣一气，对安阳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和残酷剥削。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沆瀣一气，对安阳人民进行残暴统治和残酷地剥削。使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活上日益贫困，饥寒交迫。

第一，政治上残暴统治

从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到1949年5月6日安阳城解放，安阳人民经受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日军占领时期、围困安阳时期抓兵抢粮之苦，尝到了在这三个时期受压迫、受奴役、阶级兄弟被杀戮的滋味。

1、借“连坐法”欺凌群众

1933年，河南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兼安阳县长方策，遵照蒋介石的剿共防共命令，取消了全县十大区下50个分区，新设75个镇，434个乡。当时全县123722户，691061人。乡下设立1305保，保下设立12324甲。每甲10户。如果一户通共，10户受株连。每甲

两邻，每邻五户。如果一户通共，其他四户一起坐牢。为了便于统治，户设户长，邻设邻长，甲设甲长。这就是方策在安阳推行的“连坐法”。

为了加强对安阳人民的统治，在安阳城设立了坐安司令部和县保安大队。方策兼保安司令和大队长。安阳县保安大队共编制11个中队，每队官兵117名。除一队驻县城由方策直接指挥外，其余分驻各区，归各区指挥，以便统治和镇压当推人民。

国民党政府（准确地应称：国民政府）实行连坐法，不仅限制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保甲长勒索群众，鱼肉百姓制造了借口。不少怕涉嫌疑告靠跑生意糊口的贫苦农民，只好呆在家里以求苟安。时驻安阳中共冀鲁豫边区特委机关，也被迫实行机关“家庭化”，以愚扮夫妻的形式应付敌人的“连坐法”。当时不少保长和一些区长，都在“连坐法”上走了“红运”。

2、借“治安强化运动”鱼肉百姓

1937年11月4日，日军占领安阳，将安阳改为彰德县。委任大流氓肖瑞臣任维持会长、彰德县知事。水冶、观台以西地区，仍为安阳县国民政府统治区。日军在其占领区内仍设十大区（六、七、八区均设在水冶镇）。区下仍设分区，推自然村指定地主担任维持会长、村长。

1938年10月以后，驻安日军山本联队，将全县分为：“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即边沿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和县国民政府就治区）。驻安日军为了净化治安区，实现其“以华制华”灭亡中国的战略需要，在占领区内先后收推了李台、王自全、程道生、汪怀密、许金生、韩推臣、李好敬等17股土匪、会道门武装，并委以军长、司令、团长、队长等重任，划分各自的管辖地盘，以便抽出日军进攻解放